



任继愈文集 5

任继愈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江建愈文集

5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之淵源。理學者，宋明

探究理学之渊源。
理学者，
宋明
宋濂

理学之遠源本於洙泗，
久成定論。久成定論。

徐年同
其全部思想及問題進
解
問題進解
本

但詳人之所異，異人之所詳。疑似詳。疑未

根柢不取。为明立论宗旨，贯穿五义。一曰自主。

二曰
祛名勢，
三曰
辨析異同，
四曰
叩字要，
五曰
進

一、自主自立。哲学思想即古人所谓道，所谓理。推之

目 录

中国哲学史研究五

论文二

秦汉的统一与哲学思想的变革

——“四人帮”歪曲历史的罪证之一	1
批判“影射史学”，恢复哲学史的本来面目	17
对哲学史上的问题要作具体分析	35
克服两个缺点	41
如何看待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	45
论中国哲学史上普遍存在的思想交融问题	51
老子研究的方法问题	60
访问加拿大与美国观感	67
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序	78
中国哲学史的特点	
——在“《中国哲学史稿》讨论会”上的发言	83
推荐一部哲学入门书——《通俗哲学》	97
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王夫之	101

评孙叔平著《中国哲学史稿》	108
阶段分析方法之一例	
——如何看待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民族哲学家	111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序	116
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本功	119
魏晋玄学研究如何深入	124
瞻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前景	126
论魏晋南北朝社会思潮的交融	129
《周易研究》小议	144
《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序	146
贺著《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序	149
从中华民族文化看中国哲学的未来	152
《医易汇通精义》序	164
迎接中国哲学的明天	166
把《周易》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174
关心《周易》研究,促进健康发展	179
《中国古代哲学名著今(全)译丛书》总序	183
《老子全译》前言	185
韩敬《法言注》序	201
中国哲学的过去和未来	205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领域里的贡献	221
怎样深化老子思想的研究?	231
李贽思想的进步性	235
《易》学与人类文明	239
读《易》书札	244
试论“天人合一”	247
《老子》难读	254

老学源流	259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使命感	265
中国哲学史的里程碑	
——老子的“无”	273
艾思奇同志	279
《易学智慧丛书》总序	285
在《张岱年全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287
哲学的重要性	289
“中国墨子学会”在 21 世纪所面临的任务	
——在第四届墨学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297
认识论的起点	
——《孙子兵法》序	301
李贽的悲剧结局	302
旧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	306
认识世界的方向道路	314
21 世纪的中国哲学	320
继承古代 开创现代	328
哲学必将与人类共存	338
高令印《简明中国哲学通史》序	343
李贽改革悲剧给后人的启示	345
我对《老子》认识的转变	349
我国哲学发展的正道	351
任继愈论墨子	353
寿命最短的黄老学派,效应最长的黄老思想	359
关于《道德经》	364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国哲学的未来	379

中医理论研究要跟得上国力发展	393
努力提高对中医哲学重要价值的认识	396

秦汉的统一与哲学思想的变革^{*}

——“四人帮”歪曲历史的罪证之一

“四人帮”本来是一批不学无术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收买了“梁效”“罗思鼎”之流一批文人，大讲历史，通过讲历史搞反革命阴谋。特别对秦汉之际这段历史作了不少文章。文章的中心就是大讲“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并且叫人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在这里，“四人帮”利用讲历史，影射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大批领导干部，以及他们执行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我们看看秦汉的统一是什么性质的统一。毛泽东主席有明确的指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封建的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毛泽东主席还说：“如果说，秦以前的

^{*} 原载《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

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本来,早在春秋的中期或末期,在东方各国便先后进入了封建社会,战国以来封建制已成定局。这是从历史文献以及地下发掘的文物各方面都证明了的,也为多数历史学家所公认。“四人帮”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口头上他说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可是他们文章的做法,却是认为秦始皇时候才进入封建制,以前的东方六国都是奴隶制。罗思鼎说“秦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

“四人帮”在他们的文章里经常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当他们叫喊“批孔”的时候,就说春秋时期奴隶制“已经崩溃了”“已经摇摇欲坠了”“已经没法维持了”,只有孔丘还在顽固地维护这个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可是他们谈到秦汉之际的时候,却又大讲“奴隶制的复辟是随时可能的”,赵高篡权是奴隶主势力“复辟”,吴楚七国之乱是奴隶主势力“妄图复辟”,王莽篡权也是“复辟”。在这些“历史家”看来,封建制越向前发展,奴隶制度复辟的危险性反而越大。按照他们这种逻辑,从春秋到战国,过了几百年,所谓孔丘竭力维护的“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主阶级又不但没有“摇摇欲坠”,倒反而越来越强大了。他们那个御用工具罗思鼎写文章说,秦始皇一死,赵高就篡夺了秦王朝的领导权,于是一个早晨奴隶制就复辟,封建制的秦王朝的性质就改变。照这样说,复辟倒是件很容易、也是很偶然的事情,只要一个人要一点阴谋,历史就后退了。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完全背叛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

那么,秦朝统一和秦以前六国的战争是什么性质呢?根据历史事实,可以断言它不是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矛盾。当时战国的七个大国(齐、楚、燕、秦、韩、赵、魏)都是封建制的国家,统一

是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秦与六国的矛盾是争夺统一全国的矛盾。

战国七雄都想统一。我们不能说,凡是反对秦朝的都是奴隶主复辟势力。因为当时有资格统一的不仅是秦一个国家,如东方的齐国,南方的楚国都有条件和秦来争夺统一权,就连韩、赵、魏、燕那些第二等的国家,也不是不想搞统一。按照战国的这几个国家封建化的先后来说,东方那几个国家较先进入封建社会,秦国倒是要迟一些,但是秦国后来居上,保持奴隶制的残余少一些,所以秦国反而走在前面,统一了东方六国。

这里,我们说保持奴隶制残余的多少,也是相对的,因为战国时候这几个国家的统治者的特点,都是从奴隶主贵族转化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们原先都是周天子分封的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比如韩、赵、魏以及齐国,统治者都是原先的大夫夺取了本国诸侯的领导权,由大夫的地位变成为国君的。秦国也是这样,它的国君本来就是世袭的诸侯(大奴隶主)。从奴隶主转化过来的地主阶级,都带有奴隶主阶级的烙印,这种残余在六国存在,在秦国也存在。这并不像“四人帮”所说的那样,六国代表奴隶主而秦国代表封建主,凡反秦就是搞复辟,这根本不符合客观事实,是篡改历史。

秦王朝推行法家耕战政策,统一中国后,新兴的地主阶级,意满志盈,主观上认为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根本不考虑劳动人民的愿望,它残酷压榨和奴役人民,用各种“严刑峻法”强迫广大人民无休无止地如奴隶般地服劳役。秦末劳动人民起义,就是反抗这种残酷的无休无止的劳役。陈胜、吴广的宣言曾说过,“天下苦秦久矣”。陈胜带了一部分服劳役的人误了报到的期限,误了期限就要处死。反正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这样他们就揭竿而起了。刘邦起兵反对秦王朝,也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变本加厉地这样干,例如参加秦王朝修筑宫殿、陵墓的劳动人民,从遥远的南方、东方,迢迢万里,日夜赶来,一次就是几十万。这些劳动人民过的什么生活,没有文字记载。据史书,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号称比较节俭、爱惜民力。他修建仁寿宫时,每天一车一车的建筑材料运进去,被折磨死的建筑民工的尸体一车一车地运出来,这些死者的尸体连同废土一起填平了附近的沟壑。宫殿落成后,隋文帝晚上登上宫殿的高处,只看见遍地磷火闪烁,这都是死者的骨骸发出的磷光。这形象地说明供封建地主阶级享乐的宫殿,建筑在劳动人民的尸骨堆上。秦王朝修建的阿房宫等等工程,规模远比隋文帝的仁寿宫大得多,劳动人民的死伤惨重是可想而知的。劳动力不足,他就发“闾左之戍”^①,还征“七科谪”^②。这些措施,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人们活不下去时,就会革命。秦朝就是由于使千百万劳动人民活不下去,才被推翻的。毛泽东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到的起义的农民领袖中间,首先就是陈胜、吴广。秦王朝灭亡的原因,毛泽东主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四人帮”却说因为秦王朝是进步的,所以爱人民,甚至说秦王朝是代表“黔首”的,即皇帝代表人

① 闾、里都是古代的平民聚居的单位,好像北方的胡同,南方的里弄,一条巷内住有二三十户,分为左右两排,并按五家、十家为单位组织起来。秦王朝为了大量征调劳动人民,有时强令住在闾里左边一排的适龄壮劳力全部征调。

② “七科谪”,是秦代强制服劳役的办法,对象包括七种人:(1)有罪的官吏,(2)逃亡的罪犯,(3)赘婿,(4)有市籍的贾人,(5)曾经有市籍的,(6)父母曾经有市籍的,(7)祖父母曾经有市籍的。

民利益。照“四人帮”的说法,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可以互相爱护,这是对马列主义原理的公开背叛。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前,历史上出现过进步的阶级、进步的势力,不能因为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就说它是爱人民。两者不能混淆。

从原始公社的解体到奴隶制社会的形成,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奴隶制社会对广大奴隶的压迫和剥削是极端残酷的。资产阶级比封建地主阶级进步,但当资本原始积累的时候,每一个钱币也都沾满了劳动人民的鲜血。秦王朝要统一,这是符合历史的要求,是进步的,符合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所以它成功了。秦王朝统一以后,对待人民像对待奴隶一样,激怒了人民,所以失败了。它的成功是符合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不是偶然的;它的失败是违背了人民的利益,使广大人民活不下去,逼得人民造反,这也不是偶然的。“四人帮”却故意歪曲历史,捏造什么地主阶级“爱人民”,一字不改地宣扬地主阶级美化自己统治的“黔首大安”之类的秦刻石,通过“讲历史”来论证阶级调和古已有之,这是极端反动的。

历史上说“汉承秦制”。秦朝是封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汉朝继承并巩固了它。所不同的是汉朝奴隶制的残余比秦朝少了。汉初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领导集团中,基本上来自下层。刘邦的开国功臣中,有的在县里当过刀笔吏,有的是杀狗的,有的是贩卖布的,有的是给人家办丧事时吹乐器混饭吃的,有的当过乞丐,也有的没有固定职业混日子的。刘邦自己当过亭长,是地方上一个最下级的小吏而不是官。这些人与旧的奴隶主转化过来的封建贵族基本上割断了联系。正是由于劳动人民的起义推翻了秦王朝,才使汉朝完成了秦朝没有也不能完成的这个历史任务。可见,秦汉的统一这件事,根本与奴隶制和封

建制的斗争、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没有关系。秦汉政治上的斗争,不存在什么复辟与反复辟的问题,当时的斗争就是统一与分裂,是巩固统一,还是反对统一和破坏统一的问题。

二

现在再看秦始皇统一前后的哲学思想。秦始皇在实际管理政治以前,由宰相吕不韦当政。吕不韦当政时,秦国已经在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吕不韦召集一部分门客帮他编成了一部《吕氏春秋》。“四人帮”的御用工具罗思鼎说它是奴隶主复辟的书,这完全是胡扯。《吕氏春秋》采取了先秦各家学说,拼凑起来,企图用它作为国家统一的指导哲学。书中有儒家、法家、道家,还有墨家、农家和其他许多学派的思想。它实际是杂凑起来的,构不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前一篇和后一篇,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往往自相矛盾,使人看了无所适从。这部书起不到统一思想的作用。

秦始皇自己掌握政权以后,采用《韩非子》作为他统一天下,治理国家的思想武器。这种哲学政治思想确曾一度满足了秦王朝政治上的需要,所以收得了实效。但是韩非的思想在秦王朝覆灭的过程中,暴露了以下的缺点和问题,不能充分适应地主阶级的统治需要。

第一,韩非宣扬进步的历史观,他说历史是发展的,社会是要改变的,是要不断地革新的。但一切剥削阶级,当政治上取得某种成功的时候,就停止前进。因之,像韩非关于历史进步、革新的思想,也就意味着秦王朝还要被后来的新势力取代,这是已取得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所不愿接受的。秦始皇的要求就很清楚,他是第一代皇帝(始皇),他的儿子叫二世,孙子叫三世,以至

万世。他希望天下的人民万世受他们奴役。变革、革新的思想不再需要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观点,如果秦始皇早日看到,他会乐于接受的。对汉代和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当然也是这样。

第二,韩非反复讲如何统治人民。他公开宣扬统治者与人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对统治者有利的事情,对人民就不利;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对统治者就不利。双方的关系是绝对对立的关系。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只有加紧镇压人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建筑在互相利用、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上。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是利害相反、绝对对立的关系。这本来也是事实,但是剥削阶级大喊大叫地宣称他们是剥削人民的,他们和人民的利害是绝对相反的,一点也不掩盖自己的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这对统治者并不利。赤裸裸地讲剥削和压迫,光讲镇压人民的一手而不讲欺骗人民的一手,只讲刽子手的职能而不讲牧师的职能,对亲眼看到秦王朝垮台,并充分利用秦王朝的这一弱点代替了秦王朝的汉王朝的统治阶级来说,显然认为这是很愚蠢的。

第三,法家的哲学公开讲“术”。“术”就是驾驭群臣的阴谋诡计。法家韩非强调国君前后左右充满了敌人,大臣不可信,宦官不可信,后妃也不可信。国君整天提心吊胆地提防着可能随时发生篡弑的政变。封建集团内部,钩心斗角,互相争夺,也本是常有的事,但把它绝对化,认为凡是大臣、宦官、后妃一定有篡弑的企图,以致上下猜疑,这对于形成一个较稳定的统治集团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国家没有好处。封建社会的“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和家庭内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共产党宣言》)当然是虚伪的,但对地主阶级是不可缺少的。公开宣扬不要这种“面纱”,对于协调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不利。

第四,法家的哲学对法令以外的其他上层建筑的用处缺乏认识。上层建筑包括法律、政治、道德、艺术、宗教、哲学……范围很广。韩非的思想中只有法令一项,他认为只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韩非子·六反》)。人民不过是会说话的劳动工具。这样就忽略了上层建筑其他部分的重要职能和作用。秦王朝企图以“焚书坑儒”来实行思想上的统一,收效并不显著。

自商鞅变法奖励耕战,鼓励一家一户的生产,规定男子成年必须与父母分居,另立门户,女子到一定年龄必须出嫁,以增加劳动力和纳税的服役人口以来,小农经济得到了发展,但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繁重的劳役、兵役等等,又严重干扰、破坏了这种小农经济。秦朝的农户都是小家庭,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被抽调去服劳役,一旦抽走能活着回来的机会不多,“戍死者固十六七”(《史记·陈涉世家》),即使有田也无法耕种,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

汉初的黄老思想正是根据当时经济形势的要求而提出并得以流行的。黄老学派起源于战国中期,是假托黄帝的名义,吸收老子哲学中“无为”、使民“自富”“自朴”的政治思想而形成的一个学派。它是战国中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许多思想流派之一。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中有《经法》《十大经》等即黄老学派的重要典籍。西汉初年的陆贾以及稍后的司马谈(他自称道家),按其思想实质,都属黄老学派。它反映了汉初全国统一形势下发展小农经济的要求。因为当时楚汉连年战争之后,人民穷困,户口减少,壮年劳动力缺乏,耕畜减少,经济急需恢复。刘邦进入咸阳以后,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减轻严苛的法律规定,已开始采取黄老的思想。“四人帮”的工具罗思鼎等胡说《经法》《十大经》等是“法家”著作,又说不通,便玩弄手法,说什么汉初

的黄老思想是什么“道表法里”，这完全是信口胡说。汉初有名宰相曹参，在齐国作相时，请了黄老学者盖公当他的老师和顾问。盖公对曹参提出“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建议，行之数年，齐国大治。后来，曹参继萧何为相，用这一思想在全国推广。曹参的继任者陈平也是学黄老之学的。不干涉、少干涉是黄老哲学的根本精神。从汉初到武帝以前，统治者所以采取黄老哲学，是因为当时经济非常困难：“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剥削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本性，并非汉初的地主阶级仁慈一些，主张不剥削、少剥削，主要原因是当时人民没有什么东西可供剥削，地主阶级不得不“轻徭薄赋”，减少剥削的数量，这比“竭泽而渔”对它更有利些。汉初采取黄老之学以维持其统治，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有直接的关系的。汉初的统治者，正是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讲黄老无为，不过是为了积蓄力量，准备有为。

三

从汉初到武帝几十年推行黄老之学的“无为”政策，果然对封建经济起到了恢复和发展的作用。到汉武帝时就较富足了。史书记载说，当时国家积累的粮食，仓库里都装不完，积存以至腐烂。钱也很多，仓库里一层层堆积起来，穿钱的绳子都朽烂了。这说明汉王朝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为政治上军事上的“有为”打下了基础。西汉初年中央统一政权对地方割据势力（先是异姓王后是同姓王）屡次打击，但矛盾仍然存在；对北方匈奴贵族奴隶主政权的掳掠，一直无力解决，到了汉武帝时代，已经不

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加以解决。另外,由于小农经济的分化,兼并的盛行,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在这样的形势下,再提倡“黄老无为”,就会束缚统治阶级自己的手脚,于是黄老哲学也必然遭到罢黜的命运。

这时,为了巩固封建统一政权,为了进一步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搞大一统,思想统一这个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了,董仲舒哲学思想就应运而生并受到重视。董仲舒在《天人对策》中曾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是说,当时思想很混乱,各种思想流派并存,上面没有统一的思想,下面就无所遵循。董仲舒正式提出,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除《六经》、孔子的学说外,其他的学说都要制止,这样就可以让人民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秦始皇“焚书坑儒”与汉武帝“尊崇儒术”,这两件事的做法相反,目的是一个,是沿着同一条路线发展下来的。都是要适应当时经济、政治大一统的状况和要求,而提出思想意识上的大一统。

有了统一的政治局面,才会产生统一的哲学。秦汉封建大一统的局面,在我国历史上是件新事,也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统治阶级为了寻找(或者说是建立)对它有用的哲学体系,不是一帆风顺的。要在与旧思想斗争中探索前进,需要有一个过程。

先秦“百家争鸣”的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和诸侯割据纷争以及兼并战争的盛行。秦统一后用强硬镇压的措施把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定于一尊的地位,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涛淹没了秦王朝,同时也推翻了“法家”的一尊地位,宣告了秦始皇用禁私学、焚《诗》《书》百家语来统一思想的做法

的失败。西汉的统治者,初期虽然“崇尚黄老”,却并不排斥百家,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这时都有所活动。但是由于面临的是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各派都为建立统一的封建主义上层建筑而出谋献策,向地主阶级的“皮”上去“附”,都在吸收他家的观点,改变着自己的面貌,便出现了“百家交融”逐渐合流的趋势,在逐渐形成新学派。这个新学派主要奠基者就是董仲舒。虽然历史还习惯地称之为“儒家”,但从内容到形式,他和先秦的“儒”有很大的区别,汉武帝所尊的“儒”并不是先秦的儒。我们不能光看学术流派的师承传授的世系表,主要是看它属于哪一个阶级,为什么人服务。

汉初儒家得到重视,也不是从董仲舒开始的。建元元年(前140),汉武帝十七岁时,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这条建议得到武帝的批准(“奏可”)。建元五年(前136)春置五经博士。五经都是儒家的经典,用儒家的经典作为国家的教材。前一件事是“罢黜百家”,后一件事是“尊崇儒术”。当时汉武帝还不认识董仲舒这个人。到了元光元年(前134),“诏贤良对策”,才选拔了公孙弘、董仲舒。

政治形势、阶级形势变了,各家学说的内容也不得不随着有所改变。某家的招牌仍旧,推销的货色却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比如法家人,一向强调尚贤使能,论功行赏,反对用资历限制人的选拔。但我们试看下面这一段话:“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又说:“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说的是选用官吏,不能光看资历,主要看才干、能力。这两段话,不是很像法家吗?它